

# 先秦蜀地农业的有关材料与研究

邹 一 清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都 610068)

**摘要:**通过对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表明,古蜀是一个物产丰饶、农业经济发达的地方,体现在其农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的栽培三大农业经济区域的形成以及水利建设成就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先秦;古蜀;农业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6)06-0009-05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学术界对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的研究已经历时70余年,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更为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丰富的材料。学术界对巴蜀文化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不但彻底否定了“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而且提出了“三星堆文明”、“巴蜀古代文明”和“巴蜀是中华文明又一个发源地”的崭新论断<sup>[1]</sup>。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各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公开发表出版的有关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著达1000篇(部)以上<sup>①</sup>,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族属、地域和迁徙,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文明起源与形成,文化交流与传播,巴蜀文字和符号,宗教,艺术,科技等方面。本文仅对先秦蜀地农业研究的材料和成果进行梳理和综合分析论述<sup>②</sup>。

过去,人们常将先秦蜀地说成是蛮荒之地,但通过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出,古蜀其实是一个物产丰饶、农业经济发达的地方。

## 一 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古蜀地区土地肥沃。《史记·货殖列传》称颂道:“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

木之器,南御滇、夔,夔童。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綰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sup>[2]3261-3262</sup>《汉书·地理志》也道:“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夔童,西近邛、笮马牦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sup>[3]1645</sup>

考古资料显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波及大渡河流域和川东长江沿岸以至三峡以东地区的各个古蜀文化遗址中,均出土大量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大致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中归纳成都平原诸遗址所出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铤、凿、矛、杵等,打制石器主要为盘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有柄石锄、斧形器等<sup>[4]</sup>。《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记载大渡河流域汉源背后山类型诸遗址,多见磨光石斧、石铤以及一些玉质白色细长形凿、铤、削等<sup>[5]</sup>。《四川忠县 井沟遗址的试掘》报告了川东长江沿岸的忠县 井沟遗址,生产工具多取材于卵石,打制较多,主要器形有石斧、有柄石锄、石矛等<sup>[6]</sup>。种类如此繁多的农业生产工具,是古蜀农业已脱离原始阶段,进入锄耕农业阶段的有力证据。

但文献资料没有留下古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农

收稿日期:2006-07-23

作者简介:邹一清(1962—),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

业革命”的任何记录,仅有《华阳国志》、《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了殷周及以后有关古蜀地区农业经济的状况。

农业始于对野生植物的栽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正义》曰:“蹲鸱,芋也。言邛州临邛县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华阳国志》云汶山郡都安县有大芋如蹲鸱也。”<sup>[2]3277-3278</sup> 古代成都平原多种芋类,汉代画像砖中也有人类种植芋类的画面<sup>[7]</sup>,说明芋类是先秦蜀人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关于蜀地稻作农业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基本都认为蜀地的稻作农业是从外地传入的。至于从何地传入,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一种观点是:华南和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的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此观点以严文明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在杭州湾,从公元前5000年代到3000年代形成三次大的传播浪潮,成波浪形逐级向长江三角洲、两湖盆地(包括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和江淮地区广泛的范围推进发展<sup>[8]</sup>。另一种观点是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是从云南传入的。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他认为:云南南部、广西南部和中南半岛都处于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内,这也就是栽培稻的起源地<sup>[9]</sup>。李昆声根据地理、环境、气候、植物的种类等因素,以及云南省农科院对云南稻种进行的同功酶分析,认为云南现代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现代普通野生稻,从而指出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因此,云南北有可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sup>[10]</sup>。外国学者也有不少类似观点<sup>[11]</sup>。

而《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按:此指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sup>[12]182</sup>

古蜀地区的农业决不是始于杜宇时代。但杜宇来自于云南昭通,他将云南的栽培稻技术带入蜀地,应是很有可能的<sup>[13]</sup>。杜宇“教民务农”于先,开明王朝大兴水利继后,于是蜀地“民得安居”,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地沃土丰”,“居给人足,以富相尚”<sup>[12]225</sup>。

《山海经·海内经》说道:“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

冬夏播琴。”<sup>[14]445</sup>按照蒙文通先生的研究,《山海经·海内经》是关于古蜀的作品,成书不晚于西周中期<sup>[15]</sup>。“都广之野”,指成都平原。而“膏菽、膏稻、膏黍、膏稷”,应是当时的几个主要农作物品种,郭璞注曰:“言味好皆滑如膏。外传曰:膏粱之子,菽豆粢粟也。”郝懿行疏云:“赵歧注《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均为上等佳品。可见至少在殷周之际,古蜀的腹心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中国栽培水稻的中心种植区之一。

## 二 经济植物栽培及农业经济活动

古蜀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为世所闻名外,经济林木、蔬菜瓜果也为人所称道。《汉书·地理志》记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sup>[3]1645</sup>《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盛产)桑、漆、麻、苧……园圃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sup>[12]175-176</sup>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到汉初唐蒙在南越吃到的“蜀枸酱”,也是“独蜀出”,《集解》引《汉书音义》云“蜀人以为珍味”<sup>[2]2994</sup>。按照《文选·蜀都赋》所说,后来才“流味于番禺之乡”<sup>[16]79</sup>。

茶叶也是蜀中特产。如《华阳国志·蜀志》说:“南安、武阳皆出名茶。”<sup>[12]281</sup>

制盐是与农业经济经济有关的活动。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南安(今乐山市)有“盐溉”<sup>[12]281</sup>。溉,张澍《蜀典》释曰:“溉,为水中滩碛之名。”<sup>[7]卷7</sup>南安盐溉,应是蜀人就地取煮盐水之地。《水经·江水注》说南安是“蜀王开明故治”<sup>[18]卷33</sup>,也应与开明王朝控制南安之盐有关。

岷江上游是另一产盐之地。《太平御览》卷52引《华阳国志》记载:“汶山有碱石,煎之得盐。”<sup>[19]254</sup>《后汉书·冉駹夷传》所记同<sup>[20]2858</sup>。《太平御览》卷865引任预《益州记》又说:“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sup>[19]3841</sup>是为岩盐之类。

古文献中关于蜀人制盐的记载虽然不多,但从《华阳国志·蜀志》所记秦灭蜀后第五年就在成都置“盐、铁,市官”<sup>[12]196</sup>来看,蜀的产盐量应该很大。

种植农业的发展促进了酿酒的兴起。在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包括各种酿酒器具、盛酒器和饮酒器,既有陶质的,也有青铜质,林向先生认为,从大量酒器做成束颈、侈口的器形看,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蜀酒,似乎与中原连糟食用的“汁滓相将”式酒不同,很有可能是去滓后饮用

汁液的低度发酵酒<sup>[21]</sup>。战国时,蜀人庙堂祭祀用的酒称为醴,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糟食用的浊酒<sup>[22]</sup>。

### 三 蜀地的农业经济区域

蜀地有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沔嘉陵江等三个农业经济区。

#### 1. 成都平原经济区

古蜀有若干农业经济区,成都平原是开发最早、面积最大和最重要的农业经济中心。

成都平原是大河冲积扇平原,地形西北高,东南低,岷江、沱江及其支流自西北流向东南,纵贯平原,为自流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土质疏松,渗透性良好,保温力强,通气易碎,涵水力强,含有深厚而丰富的腐殖质,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考古资料表明,至迟在距今 5000 年前,成都平原的农耕村落已初步兴盛起来。夏商时代,在农业极大发展的基础上,成都平原已进入阶级分化和城市形成的历史进程,进而产生文明。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指挥街遗址第六层的商代文化因素等等,无一不为这一时期古蜀农业经济成片分布的情景,提供了有力证据。

殷周之际杜宇入蜀,促进了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太平御览》卷 888 引《蜀王本纪》记载道:“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sup>[19]3944</sup>江源,或作江原,为今成都平原中部崇庆县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盛称江原“小亭有好稻田”<sup>[12]242</sup>。

如前文所述,杜宇入蜀后,“治汶山下,邑曰郫”,“教民务农”。春秋战国时代,蜀王开明氏在蜀大兴水利,“民得安居”,使成都平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处处“有渔、田之饶”,“有好稻田”,“有美田”等记载,史不绝书。而且,四川盆地周邻地区的各种生产性经济,都曾程度不等地受到过成都平原农业经济的渗透和影响。

#### 2. 岷江上游经济区

古文献记载,岷江上游属于蜀文化区之一,三代蜀王中的蚕丛,便兴起于此。《华阳国志·蜀志》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

椁,国人从之。”<sup>[12]181</sup>

蚕丛兴起的地区,为蚕陵。《汉书·地理志》有蚕陵县<sup>[3]1598</sup>,治今阿坝茂县北的叠溪。陈登龙《蜀水考》卷 1 陈一津《分疏》说,此即汶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sup>[23]卷1</sup>。《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sup>[24]卷4</sup>

段渝认为,岷江上游地区的农业最早属于高地农业。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文化遗存越往高地,其年代越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这类高地农业,经过一定程度发展,又往往向低地拓展移殖。史籍中所见今都江堰市一带的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以及成都平原所见蚕丛氏的考古文化遗迹,就是高地农业向低地拓展移殖的例证<sup>[25]</sup>。

岷江上游地区的粗耕农业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大约兴起于五帝之际的蚕丛氏,就是当地一个经营粗耕农业并兼事畜牧的族类。汶川增坡曾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窑藏生产工具,有斧、斨、凿,体小扁薄,均经磨制,器形与广汉真武官所出相近,而更为原始<sup>[26]</sup>。

《尚书·禹贡》说:“岷、蟠既艺”<sup>[27]150</sup>,艺为种植的意思,即言岷山地区已得到开发并种上了庄稼。上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又说明蚕丛氏已经定居。这两条材料合起来看,其实证明了蚕丛氏是以经营定居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蒙文通认为,岷山河谷是最早开拓的地区,蜀的农业即是岷山河谷开始的<sup>[28]47-48,75-82</sup>。岷江上游曾发现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新石器彩陶和磨制石器共存的情况,这些材料早于当地畜牧业兴起的材料,无可置疑地揭示出农业起源年代很早的事实,也让人看出蚕丛氏首先是作为一个农业族类兴起于此的。

从大量石棺葬中出土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日常生活用陶器以及各种动物骨骼来看,可以证明岷江上游经济的特点是农业与畜牧相结合。如汶川萝卜寨 SLM3 墓内出土的粮食作物,经鉴定为粟稷之属<sup>[29]</sup>。茂县城关石棺葬内出土大量谷物,盛于釜、釜、罐内,经鉴定为皮大麦<sup>[30]</sup>。理县佳山石棺葬 IM2、IM4 内,出土盛于豆、罐等容器中的粮食,亦为皮大麦<sup>[31]</sup>。皮大麦俗称“水米子”,是高地农业的一种耐寒、耐旱粮食作物。《华阳国志·蜀志》说岷江上游地区“土地刚卤,不宜五谷,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sup>[12]295-296</sup>。这种麦,看来就是出土于石棺葬内的皮大麦,它应是先秦岷江上游粗耕农



业的主要产品。

岷江上游石棺葬出土的动物骨骼,主要是羊骨,一些石棺葬内还出土青色羊毛织品,说明这里的畜牧业以养羊为主。石棺葬内还发现一些野猪、野鸡等野生动物骨骼,而《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地理志下》<sup>[3]1645</sup>、《华阳国志·蜀志》<sup>[12]295</sup>等文献都记载了岷江上游产马,青衣江流域和南中出“笮马、牦牛”,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都反映了川西高原畜牧业的发展,狩猎还是当时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

### 3. 汉沔嘉陵江经济区

本区指分布在汉中盆地并南及川东嘉陵江流域的古代农耕区,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开拓。1955年至1981年间在汉中沔水河下游约7公里的范围内,共出土商代青铜器530余件<sup>[32]</sup>,表明此地原为蜀地。

《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汉中盆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sup>[12]103</sup>“三蜀”是指蜀、广汉、犍为三郡,后两郡是从蜀郡分出的。“三蜀”皆富庶之区,即言本区农业经济仅次于成都平原,显然自先秦而然。

汉沔之南,即是川北嘉陵江谷地,也是蜀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开明王朝曾封苴侯于此,北镇汉中。段渝认为这一方面出于军事目的,一方面也带有明显的经济意图。并且,汉沔和嘉陵江经济区在古代很有可能是互为依托的,故《禹贡》既言“沱(今沱江)、潜(今嘉陵江)既道”,又说“浮于潜,逾于沔(沔水,汉水上源)”,是连为一体的<sup>[13]</sup>。

### 四 水利建设

岷江流贯成都平原,使得成都平原虽然有天然的舟楫灌溉之利,但也时常遭受洪水的侵袭。一些古典文献记载了蜀人治水、进行水利建设的史迹。

据《禹贡》记载,早在大禹的时代,岷山已经能够种植庄稼,沱江、嘉陵江已经得到整治疏通。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sup>[27]150</sup>。

蜀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古文献所盛称的鳖灵治水是其开端,年代约为春秋初年。可是,古书关于鳖灵治水地点的记载,却众说纷纭,错综复杂,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巫山说”,首见《水经注·江水

注》引来敏《本蜀论》<sup>[18]2771-2772</sup>;第二种说法是“玉山说”,见《太平御览》卷888引扬雄《蜀王本纪》<sup>[19]3944-3945</sup>;第三种说法是“玉垒山说”,见于《华阳国志·蜀志》<sup>[12]182</sup>、《水经·江水注》<sup>[18]2742</sup>。三种说法中,巫峡之说太离谱。三峡形成于地质年代学上的第三纪初,至今已有数万年之久,也决非人工开凿<sup>[13]</sup>。

玉山,见于《山海经·中次九经》。据温少峰考为巫山县以东,长江北岸<sup>[33]40</sup>。其地势低于成都平原,而且远处成都平原的长江下游。

玉垒山,据《汉书·地理志》“绵虬县”下原注云:“玉垒山,湔水所出,东南至江阳入江。”<sup>[3]1598</sup>《说文》“湔”字下记:“湔水,出蜀郡绵虬玉垒山,东南入江。”<sup>[34]225</sup>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中指出,湔水为今白沙河,玉垒山即湔水发源地以北的九顶山。玉垒山逶迤而南,直趋灌县(今都江堰市)西北<sup>[12]184</sup>。历史上岷江上游洪水泛滥,就是由此冲向成都平原的。而首当其冲者,就是杜宇的都城郫。因此,学术界普遍均认同杜宇派鳖灵治水之地为岷江上游的玉垒山<sup>[12]</sup>。

一些学者还进一步研究了蜀人治水的技术。徐中舒先生的《都江堰情况探原》指出竹络就是破竹为笼,立水中,以卵石实其中。层层累叠,可起到截流壅水,笼口垒坝等作用。这种就地取材的轻便方法,至汉代还传至中原和滨海地区,用以治理黄河水患及海塘<sup>[35]</sup>。竹编拦沙筐类似于竹络笼石。成都指挥街遗址春秋文化层内发现这种竹筐,无底<sup>[36]</sup>。该遗址临河,证实此种竹编拦沙筐与治水有关。

砌筑卵石工程的实例,发现于成都方池街遗址第4文化层内(约属东周),系用黄泥和卵石筑成的数条石梗,现有高度20—50厘米,显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处防洪排泄工程<sup>[37]</sup>。

蜀国的水利建设成就显著,农业生产得到大幅度发展。《战国策·楚策一》记载纵横家张仪说:“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sup>[38]506</sup>《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08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sup>[12]194</sup>,足见蜀地产粮之多。

### 注释:

①这是指先秦时期的巴蜀文化,即传统意义或本来意义的巴蜀文化。数据引自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

文化论坛》2003年3期。

②本文所列观点,其取舍均以原创性观点为标准,余皆不列。由于本人学识局限,难免有所遗漏,一并敬请雅谅。

### 参考文献:

- [1]段渝.巴蜀是华夏文化又一个起源地[N].社会科学报,1989-10-19.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4]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J].成都文物,1988,(1).
- [5]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C]//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 [6]四川忠县涪井沟遗址的试掘[R].考古,1962,(8).
- [7]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考略[J].四川文物,1985,(4).
- [8]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J].农业考古,1982,(1). 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J].江汉考古,1990,(3).
- [9]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分布[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3).
- [10]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J].云南文物,1984,(15).
- [11]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J].农业考古,1984,(2).
- [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 [13]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 [14]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5]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的地域[G]//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 [16]文选李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7]张澍.蜀典[G].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8]郦道元.水经注[M].杨守敬注疏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19]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1]林向.蜀酒探原[C]//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22]段渝.蜀醴享祀[C]//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289-294.
- [23]陈登龙.蜀水考[M].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
- [24]古文苑[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25]段渝.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J].四川大学学报,1988,(2).
- [26]徐学书.试论岷江上游的“石棺葬”[J].四川文物,1987,(2).
- [27]尚书[G].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29]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J].考古学报,1973,(2).
- [30]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R].文物资料丛刊,1983,(7).
- [31]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R].南方民族考古,1987,(1).
- [32]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R].考古,1980,(3);王寿芝.一批商周青铜器在城固县出土[N].陕西日报,1981-01-27.
- [33]温少峰.《五藏山经·中次九经》考释[C]//山海经新探.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3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 [36]徐中舒.都江堰情况探原[J].四川文物,1984,(1).
- [37]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C]//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38]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